

蘇聯對持不同政見者的 政策和措施

• 郭永勝

伴隨勃列日涅夫(Б р е ж н е в Леонид Ильич)執政始終的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眾對政府的不滿和對改革的要求，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黨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着大量問題甚至是危機。然而，蘇聯黨和政府卻把這些來自社會的不同聲音看作是給社會主義制度抹黑，是帝國主義思想顛覆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先聲，因此採取各種措施壓制和打擊持不同政見者運動。迫害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政策不僅嚴重挫傷一部分公民的社會積極性，導致蘇聯共產黨威信和社會主義吸引力悄然下降，為蘇共喪失執政地位和蘇聯解體埋下禍根，同時損害蘇聯和社會主義的聲譽，為西方攻擊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專制、獨裁、缺乏民主和言論自由、侵犯人權提供了口實。

一 強化意識形態 宣傳和控制

勃列日涅夫上台後，逐漸改變了赫魯曉夫(Хрущев Нма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時期的解凍方針，在意識形態領域開始了加強控制的進程。在勃列日涅夫等人看來，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判以及他所發動的政治、經濟改革削弱了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導致各種反對社會主義的思潮萌生，因而，加強政治思想宣傳工作和高度強化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成為勃列日涅夫時代的一個顯著特徵。

1966年11月，勃列日涅夫主持召開了專門討論意識形態問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他在會上強調，應該清醒地意識到過去十年蘇共意識形態工作方面存在着缺點，甚至可以說是嚴重的錯誤。「我們都清楚地知道，在十月全會前的十年以來，在這方面所犯的錯誤並不比其他領域少，甚至還多些。而最主要的是……意識形態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可能給我們帶來無法克服的危害。」^①勃列日涅夫指出，要盡快組織人員編寫一本代表當代最優秀思想的歷史課本，作為教育人民和揭示蘇聯社會美好前景的教科書。他最後總結說：「對於意識形態工作，對於宣傳工作，不能吝惜錢財……也不應吝惜時間和其他手段。」^②

勃列日涅夫上台後，逐漸改變赫魯曉夫時期的解凍方針，開始加強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並採取各種措施打壓持不同政見者運動。這不僅嚴重挫傷一部分公民的積極性，也導致蘇共威信和社會主義吸引力下降，為蘇共喪失執政地位和蘇聯解體埋下禍根，同時損害蘇聯和社會主義的聲譽，為西方攻擊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提供口實。

由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波諾馬廖夫主編的《蘇聯共產黨歷史》1970年再版發行時，刪除了1962年版批判個人崇拜的內容，為恢復斯大林的地位掃清了歷史障礙。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青年政治思想工作受到高度重視，宣傳部門教研機構出版了大量書籍，從各個角度討論如何在學生中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甚至連怎樣在大學生宿舍中開展思想政治工作都有人寫書論證。

為了落實政治局會議加強思想宣傳的精神，由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波諾馬廖夫 (Пономарев) 主編的《蘇聯共產黨歷史》第三版1970年再版發行，該書最突出的特點是刪除了1962年版有關批判個人崇拜的主要內容，從而為一步步恢復斯大林偉大統帥的地位掃清了歷史障礙。蘇共中央除了要求全社會不斷加強馬列主義理論學習之外，在每次黨代表大會後都要展開強大的宣傳活動。一向特別受到重視的青年政治思想工作在勃列日涅夫時期也達到了它的頂峰。這一時期，宣傳部門和一切有關的研究教學機構出版了大量書籍，從各個角度不厭其煩地討論如何在學生中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甚至連怎樣在大學生宿舍中開展思想政治工作都有人寫書論證。從70年代起，大學的每個班級都設置了固定的班主任，每個系每個年級配備了專職的政治輔導員，每一所大學都制定了自己的「大學生共產主義教育綜合方案」，對五年大學生活每一周開展甚麼活動、由誰組織、由誰監督、活動的具體內容等都有詳細明確的規定。

在強化宣傳的同時，政府加大了对意識形態的控制。「思想限制的範圍擴大了，成為迫害對象的人數增加了，社會的政治、精神和道德氛圍明顯地變壞了……在這一場仍在繼續進行的政治思想鬥爭中，『合法性』的界限和可以在體制內採取行動的範圍變得愈來愈窄了，人們明確無誤地知道不久前還准許說的話和曾在崇高講壇上講過的話也被置於禁止之列了。」^④尤其是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後，在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開始實行「擰緊螺帽」的方針，從國家安全委員會定期上報蘇共

中央政治局的報告能夠明顯地感到這一點。

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謝米恰斯內 (В. Семичастный) 在勃列日涅夫上台不久就向政治局報告說^④：

儘管蘇聯國內還不存在對現制度不滿和建立有組織的反政府地下組織的現象，但一些「反蘇份子」和社會大眾及創作知識份子的聯繫大大加強了。反叛者在廣大的知識份子當中獲得了同情和道德上的支持，出現了有利於反叛者發展的環境，很難把他們完全隔絕或利用沉默的人牆包圍起來。

報告還進一步強調這些人不像以前的地下活動者，他們具有更大的社會危害，國家安全委員將加強對他們的監控。

1968年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安德羅波夫 (Ю. Андропов) 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就青年學生的情緒呈蘇共中央的報告〉中說，通過監控發現青年政治思想工作狀況不容樂觀，黨的吸引力明顯下降^⑤：

對大學生來說，儘管有着各自不同的特點，但是與黨格格不入的狀況是共同的。黨對他們已不是最光明、最先進的東西的化身。他們容忍這種黨的存在，然而，呈現在他們面前的現實卻完全不同。他們所接觸的周圍現實中的共產黨員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往往在才智和學識方面還不如一般大學生，真正有原則的共產黨員很少遇到。

1976年安德羅波夫在給蘇共中央書記處的報告中則側重談了三年來監控高校學生的情況^⑥：

在青年學生中三年之內發生了324次不良表現，參加的人有4,406人……其中居主導地位的為高年級大學生（三至四年級1,447人）。

文科學校的學生參與不良行為的要比技術學校學生多。文科學校的學生佔34%，技術學校的佔28%……

發表誹謗性、蠱惑性、修正主義和其他政治上有害的意見，作為不良表現的一種形式，在數量上和參與的人數方面都是最普遍的。

報告還着重指出，大部分政治上有不良表現的學生直接受到來自國外思想的影響，如收聽外國電台廣播，閱讀走私報刊和書籍，與敵視蘇聯的外國人通信和接觸，以及秘密閱讀一些在國外流傳的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的私下出版物等。報告提出，應該繼續加強揭露並取締對青年企圖施加影響的各種組織，加大力度預防犯罪、預防政治上有害的不良表現的發生。

與此同時，政府通過各種文化團體和協會以及出版檢查機構來強化社會監控的職能，黨領導的社團組織逐漸演化為黨和政府控制知識份子的工具。60年代後半期到80年代初期，蘇聯黨和政府對知識界一些作家、藝術家、學者和文化人士的處分往往是首先開除出作協和其他協會，然後才是其他處分。由於社會團體和各種協會與黨的機構一起控制着大多數出版、評獎、出國及晉升的途徑，它的權力是很大的。兒童文學家利季婭（С. Лития）因為公開聲明反對審判在國外出版書籍的作家西尼亞夫斯基（А. Синявский）和達尼埃爾（Ю. Даниэль）而被作協開除，她在

最後一次出席的作協會議上痛心指出⑦：

今天你們對我的判決是對一個作家的最嚴厲的懲罰——在文學中不復存在……你們有權讓一個作家不復存在或從未存在過。報刊和出版社掌握在作協主席團和書記處手中……如有人說話不符合當前的觀點，便被宣布為反蘇份子；如果外國人批評我國不好的地方，便宣布他干涉我國內政。你們就是這樣領導的。

也正是這樣，索爾仁尼琴（А. Солженицын）才在〈致全蘇作家代表大會的信中〉強烈要求「在作協章程的二十二款中應該明確表述，作協將保證為自己的遭受誹謗和不公正迫害的會員提供所有的保護，保證杜絕違法現象的再度發生」⑧。

從上述來看，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中央相當重視意識形態的工作，希望通過正面宣傳和控制來削弱持不同政見者產生的土壤，黨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強化思想宣傳的措施和政策，但收效甚微。這一方面與勃列日涅夫執政以來恢復斯大林主義以及經濟長期停滯和政治體制僵化有關；另一方面又同思想政治工作缺乏針對性，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盛行密不可分。儘管政治局年年研究意識形態問題，次次都強調它的重要性，但對社會形勢和人們價值觀念趨向的變化卻視而不見，一直拿不出一套切實可行的政策和舉措，即使是通過的決議和措施大多也沒有得到執行。「蘇聯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對蘇聯部長會議通過的決議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令人震驚，實際執行的決定不超過十分之一。」⑨

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希望通過正面宣傳和控制來削弱持不同政見者產生的土壤，黨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強化思想宣傳的措施和政策，但收效甚微。這一方面與勃列日涅夫執政以來恢復斯大林主義以及經濟長期停滯和政治體制僵化有關；另一方面又與思想政治工作缺乏針對性，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盛行密不可分。有研究發現，蘇聯部長會議通過的決議，實際執行的不超過十分之一。

二 「思想顛覆」罪名與建立 主管知識份子工作的克 格勃第五局

持不同政見者運動是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一個久拖不決的重要政治問題，黨和政府為了解決它費盡心機，在強化思想意識形態宣傳和控制的同時，積極展開所謂的「思想鬥爭」，即反對持不同政見者的鬥爭。

勃列日涅夫就持不同政見者問題專門指出^⑩：

他們進行反蘇活動，違背了法律，因而在國內得不到支持，於是轉而尋求國外的支持，乞援於帝國主義的顛覆中心——煽動和情報中心。我國人民要求把這樣的活動家——如果可以用這個字眼來稱呼他們的話——當作反社會主義份子，當作反對自己祖國的敵人，當作帝國主義的幫凶，即使他們不是真正的特務。

在實際工作中，黨和政府也總是把持不同政見為完善社會主義而提出的批評看作是反對社會主義的活動。從蘇共中央政治局的絕密文件中我們可以看到如下內容^⑪：

「持不同政見者」對社會主義的「批評」實質上是否定社會主義，是同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同共產黨人進行鬥爭的一種方式。這種「批評」在行動上正在變為有組織的、受帝國主義操縱的反蘇活動。

同時，絕密文件還進一步論證到^⑫：

「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和國際階級鬥爭的發展密切相互聯繫還可以從下述

事實得到證實。在這些人中間，有一部分是在60年代中期，也就是在帝國主義推出「軟化」社會主義的口號的緩和時期宣布自己是蘇維埃制度的各色的敵人。他們在那個時候（包括現在）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提出的指責正是資產階級的宣傳家們曾經和正在提出的那些指責。他們的要求也和西方國家「軟化」社會主義的要求相類似。

60年代中期，面對日益高漲的要求民主和言論自由，保障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能夠切實得到履行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蘇聯政府和安全部門迫切須要利用法律措施來加大打擊力度。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思想顛覆」這個概念開始出現在俄羅斯聯邦刑法條文的說明之中，主管知識份子工作的克格勃第五局也應運而生。從1966年6月8日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和蘇聯總檢察長致蘇共中央委員會的絕密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方面的材料^⑬：

最近幾年國家安全機構加強關於注意和制止有損國家的犯罪行為的預防工作，它的數量一年年在不斷減少。在這一工作進程中，主要政權機構不得不面對現實矛盾，一些活動具有很大的社會危險性，然而，按照現行刑事法律條文又不受懲罰。

下述現象就屬於此例：製作和傳播沒有破壞目的，或者是削弱蘇維埃政權的傳單和一些帶有污穢和攻擊蘇維埃國家政權性質的書面文獻，而其中某些形形色色的反社會份子還企圖利用蠱惑性的藉口，組織集會、遊行和公開講演，反對政府和社會機構的個別措施。

……我們的法律沒有預見到這種沒有破壞目的和削弱蘇維埃政權的故

蘇共中央政治局的絕密文件指出：持不同政見者的批評實質上是否定社會主義，並正在變為受帝國主義操縱的反蘇活動。60年代中期，面對日益高漲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蘇聯政府和安全部門迫切須要利用法律措施來加強打擊。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思想顛覆」這個概念開始出現在俄羅斯聯邦刑法條文之中，主管知識份子工作的克格勃第五局也應運而生。

意活動的重要性，這具有巨大的社會危險性。

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很快就頒布了專門針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刑法增補條令^⑭：

增補俄聯邦刑法第九章關於反社會秩序罪190條1；2；3如下：

190條1，傳播明顯的虛假謠言，誹謗蘇聯國家和社會機構罪。

190條2，侮辱蘇聯、俄聯邦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國國徽、國旗罪。

190條3，組織或者積極參加違反社會秩序的有組織活動罪。

新增加的俄羅斯聯邦刑法190條內容具有很大的伸縮性和模糊性，而且，判罪的依據更側重於行動可能帶來的後果方面，「任何批評、聲明或者是出版物思想上對蘇維埃國家和制度有害，就可以追究刑事責任。」^⑮第190條第三款懲罰的依據不是因為參與團體行為本身，而是看其是否違反了社會秩序，不服從政府代表人員的要求，干擾交通運輸和企事業單位正常工作等內容，至於其是否符合憲法要求則無關緊要。這樣一來為執法機構隨意解釋法律條文，迫害持不同政見者留下很大的空間。俄羅斯聯邦刑法第190條還進一步規定^⑯：

為了顛覆和削弱蘇維埃政權，進行危害國家的罪行而從事的煽動和宣傳，或者出於同樣的目的，書面散布誹謗蘇聯政治和社會制度的謠言，以及傳播、準備和保存有這種內容的文藝作品。凡違反者將被判處七年以下監禁，外加五年以下的國內流放。

以上這些內容不僅僅出現在俄羅斯聯邦刑法中，其他加盟共和國刑法中也有同樣的內容。正如科茲洛夫(B. Козров)評述的那樣：「中央政權機構終於創造性地找到了在政治形勢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對付人民不滿的方法，因為這些不滿都是通過符合憲法原則的要求表達的。」^⑰

「思想顛覆」這一概念正是在說明上述法律條文的蘇聯法律文獻和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刑法典中出現的。「它是指那些用於人們的思想感情的手段，其目的在於破壞、損害和削弱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影響，在於削弱和分裂革命運動、民族解放運動和社會主義制度，並且是通過合法的或非法的途徑利用誹謗性的、偽造的、或者是帶有傾向性的材料去實現，以造成意識形態方面的損失。」^⑱

為了加強同所謂的「思想顛覆」活動進行鬥爭，反對持續不斷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1967年7月3日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安德羅波夫向蘇共中央提出組建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五局的請求^⑲：

在敵對的意識形態影響下，一部分政治上不成熟的蘇聯公民，尤其是知識份子和青年當中，正在形成不問政治和虛無主義的情緒，這不僅有可能被明顯的反蘇份子所利用，也有可能被喜歡在政治方面胡說八道、煽風點火的人所利用，以促使這類人採取政治上有害的行動。有鑑於此，我們建議在中央和地方建立一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獨立部門，其任務是組織反間諜工作並與境內的思想顛覆活動作鬥爭。

政治局批准了安德羅波夫的建議，7月底克格勃的一個新部門——第五局就組建完成。

1967年7月3日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安德羅波夫向蘇共中央提出組建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五局的請求。政治局批准了他的建議。第五局初期大約有二百多人，60年代下半期，大量資金投入到秘密政治監控之中。1967年克格勃一年當中招募了24,952個新情報員，超過當年揭露出的持不同政見者人數的二倍還多。

由於持不同政見者的許多活動並不違反蘇聯憲法，國家安全機關在處理持不同政見者問題時，常常力圖訴諸行政手段和其他措施，盡量減少公開審判，避免激起國內外的強烈反應。除在政治上施加壓力之外，政府常用的辦法是開除黨籍、公職，收回住房、取消莫斯科居住的權利等等，甚至可以用「寄生蟲」生活方式的名義把不同政見者遣送到邊遠地區管制勞動。

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五局初期大約有二百多人，但隨着與持不同政見者的鬥爭擴大，成員和組織機構不斷膨脹。「60年代下半期，大量資金投入到秘密政治監控之中。1967年克格勃強化了自己偵察機構的工作，在一年當中招募了24,952個新情報員，佔全部情報員的15%，並超過當年揭露出的持不同政見者人數的二倍還多。」^②科茲洛夫在〈造反：蘇聯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持不同政見者〉一文中，根據最新檔案材料推算出，在60年代結束時期，「整個克格勃情報機構大約有16.6萬人，這遠遠超過了蘇聯人民所了解的克格勃情報員無所不在的傳統想像。但只有這樣才能滿足控制對當局來說有危險趨勢的社會階層和團體組織。」^③而且，為了監督人們的思想和情緒，黨的領導愈來愈經常訴諸特殊手段進行這種調查工作的專門機關。阿馬利里克(A. Амальрик)在《蘇聯能生存到1984年嗎？》(Will Soviet Union Survive Until 1984?)一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開始時，當局花費很大的氣力迫使大家沉默，不要公開表達自己的意見，而後又花費大量精力去了解人們究竟在想甚麼，以及他們想要甚麼。」^④這種調查和控制的任務主要由國家秘密機關安全部門來承擔，這一方面造成了國家安全機構不正常的膨脹，另一方面又使缺乏民主的現象繼續存在下去。

思想顛覆罪名的設立和俄羅斯聯邦刑法190條的增補，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五局的成立，是勃列日涅夫時期政府與持不同政見者作鬥爭的重要舉措之一，它不僅為國家安全機構懲罰持不同政見者運動提供了所謂的法律依據，同時也為強力機關迫害不服從的公民大開方便之門。

三 政治施壓、分化瓦解和逮捕關押

由於持不同政見者的許多活動從法理上講並不違反蘇聯憲法，這給執法機構處理持不同政見者問題增加了難度，特別是70年代中期《赫爾辛基協議》簽署後，還面臨着國際社會保護人權的壓力，因此，國家安全機關在處理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問題時，力圖通過行政手段和一些其他措施，盡量減少公開審判，避免激起國內外的強烈反應。

政治上施加壓力、分化瓦解是政府對付持不同政見者常用的辦法。持不同政見者首先面臨的是開除黨籍，開除出各種專業協會，開除工作的危險。加蘭斯科夫(Ю. Галансков)和金茲伯格(А. Гинзбург)這兩位大學生，因為編輯和散發有關審判在國外發表文章的西尼亞夫斯基等人的材料而被政府判刑。「凡是在要求審判加蘭斯科夫和金茲伯格時遵守法律的各種請願書上簽名的人，在一個月內就有15%的人被單位解僱，而且所有的蘇共黨員都被開除出黨。」^⑤因為不同政見而被開除公職的人，很難再找到工作。因此，儘管許多人對政府鎮壓捷克「布拉格之春」的政策不滿，但真正敢於站出來公開自己主張的人畢竟還是少數，至於到莫斯科紅場遊行示威的人更是微乎其微。

政治上施加壓力的措施多種多樣，除了開除黨籍、公職之外，收回住房、取消莫斯科居住的權利，甚至可以用「寄生蟲」生活方式(不勞而獲)的名義把不同政見者遣送到邊遠地區管制勞動二到五年。寄生蟲懲罰措施「既可以消滅失業，補充邊遠地區的勞動力，又可以清除城市中的『反社

會份子』。這個命令也是一種方便的手段，可以用來鎮壓不合心意的知識份子」²⁰。這是克格勃懲罰一些持不同政見的自由作家和畫家常用的做法。198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布羅茨基(Бродский)就曾被列寧格勒法庭以「寄生蟲生活方式」的罪名，判處強制改造勞動五年。

對薩哈羅夫(А. Сахаров)院士的處理就是政治上施加壓力的一個典型事例。薩哈羅夫是蘇聯氫彈之父，由於支持和參加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特別是1970年參與創建蘇聯人權委員會後，國家安全委員會就進一步加大了對他的政治壓力²¹：

最近以來，西方的宣傳機構為了達到反蘇目的愈來愈廣泛地利用薩哈羅夫院士的信件和「專題論文」。薩哈羅夫發表了他的意識形態上有害的論文〈關於進步、和平共處和思想自由的思考〉後在西方成了名人。敵人的意識形態顛覆中心積極利用薩哈羅夫的名字，把他當作蘇聯存在的所謂「反對派運動」的最重要代表。薩哈羅夫顯然對資產階級的宣傳工具這樣介紹他感到高興，他一直不斷地為維護像布科夫斯基(В. Буковский)、羅伊·麥德維傑夫(Рой. Медведев)等反社會的份子而發表各種抗議和信件……薩哈羅夫反社會的活動客觀上日益同敵人意識形態中心的破壞活動結合在一起了。在這種情況下產生了對薩哈羅夫的行動作出公正反應的必要性問題。

1973年9月6日，蘇共中央書記處通過了「關於薩哈羅夫反社會的活動」的長篇通報，開始掀起大規模批判薩哈羅夫的高潮。報刊上發表了大量各行各業聲討薩哈羅夫的文章，其中尤

以四十位蘇聯科學院院士的公開信比較著名²²：

薩哈羅夫近年來不在積極參與科學工作，並發表一系列關於蘇聯政府及內外政策的聲明。不久前在莫斯科接受外國記者採訪並在西方報刊上發表的訪談中，他竟然反對蘇聯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並在全世界積極推進緩和的政策。

這些觀點嚴重地危及追求進步的全人類的利益，而薩哈羅夫企圖以嚴重歪曲蘇聯現實狀況及未經證實的批評社會主義秩序來自圓其說。他在自己發表的言論中竟然表示擁護帝國主義反動陣營反對我們提出的國家間和平共處、科學及文化合作，以及推進世界和平的政策。薩哈羅夫的言論已經淪為帝國主義反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工具……

不僅如此，黨的機關還多次要求科學院剝奪薩哈羅夫的院士頭銜並開除其公職，但由於擔心無法通過按科學院章程須進行的不記名投票而不了了之。

1975年10月，薩哈羅夫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後，蘇聯政府在國內外再一次掀起批判他的新浪潮。1979年12月蘇聯入侵阿富汗，薩哈羅夫發表公開信，希望「蘇聯和阿富汗游擊隊立即停止軍事行動，並簽訂停戰協定……在聯合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參與下確保阿富汗的中立、和平與獨立」²³。政府很快就發布了「關於把薩哈羅夫從莫斯科驅逐到一個不能同外國記者接觸的地方的決定」²⁴，把其流放到高爾基城。

這種連篇累牘地迫使人們去批判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行為，不僅在國

1975年，薩哈羅夫獲諾貝爾和平獎後，蘇聯政府再一次掀起批判他的新浪潮。1979年12月蘇聯入侵阿富汗，薩哈羅夫公開呼籲蘇聯和阿富汗游擊隊停戰，很快就遭到流放。而這種不斷地迫使人們去批判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行為，嚴重地毒化了國內的政治氣氛，扼殺了文學藝術界、社會輿論界、一般知識界和一切善於思考的人的積極性。

逮捕審判和關押是政府懲罰持不同政見者最常用的方法，但每一次逮捕審判持不同政見者，總會激起新一輪的抗議，引發更廣泛的社會反響。一百五十名烏克蘭知識份子在給勃列日涅夫的信中指出：被告僅僅是批評我國社會生活中的個別現象，或者批評明顯背離社會主義理想和公然破壞正式宣布了的準則的行為。這種批評對於任何社會的健全來說都是必要。

外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而且嚴重地毒化了國內的政治氣氛，扼殺了文學藝術界、社會輿論界、一般知識界一切善於思考的人的積極性，使業已惡化的政治環境更趨嚴重，被批判的人和批判他的人同樣受到嚴重傷害。阿爾巴托夫 (А. Арбагов) 院士曾痛心地寫到^⑳：

對於許多人來說，甚至對於不是迫害的直接犧牲者說來，同持不同政見者作鬥爭意味着嚴重的人身傷害。通常的做法是迫使著名的科學家和文藝活動家簽署公開信，尖銳批評引起不滿的科學活動家、作家和藝術家。拒絕簽字的將遭到不幸——有時這等於是罷黜他們的第一步。同意簽字的，則會遭到同事和朋友的蔑視……這些做法更嚴重地毒化了社會空氣，毒化了人們之間的關係。

逮捕審判和關押是政府懲罰持不同政見者最常用的另一種方法，尤其是在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初期，國家安全委員會更希望通過這一措施起到震懾作用。

1965年9月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逮捕了在國外發表文章的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分別判處二人七年和五年徒刑。1967年又因為編輯並在西方出版有關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案件訴訟材料《白皮書》，逮捕審判了金茲伯格、加蘭斯科夫、拉什科娃 (В. Лашкова) 和多勃羅沃里斯基 (А. Добровольский)。而後又逮捕並審判了發起聲援支持金茲伯格等人的鮑戈拉茲 (Л. Богораз) 和李維諾夫 (П. Литвинов)，以及反對蘇聯鎮壓捷克「布拉格之春」而遊行示威的人。每一次逮捕審判持不同政見者總會激起

新一輪抗議簽名，對抗議簽名者的警告、開除公職和其他制裁，又引發更大、更廣泛的社會反響，又有更多的人參加到反對政府審判的簽名和遊行示威活動中來。

一批哲學家在給蘇共中央的信中寫到^㉑：

蘇維埃國家的歷史上，還從未有過作家因撰寫和出版(在國內或國外)反蘇維埃、反國家的文藝作品，被控從事反蘇維埃、反國家的活動而遭到逮捕和公開審判的情況……

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案件……給我們的制度，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意識形態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造成的損害，遠遠超過某個私人的任何反蘇作品，因為作品畢竟是作品，而事實畢竟是事實。

一百五十名烏克蘭知識份子代表在給勃列日涅夫的信中更直接指出^㉒：

被告被指控為有罪的言論和他們所捍衛的觀點，絲毫沒有反蘇維埃的性質，而僅僅是批評我國社會生活中的個別現象或者批評明顯背離社會主義理想和公然破壞正式宣布了的準則的行為……近幾年來進行的政治訴訟案已成為鎮壓持不同政見者的一種形式，成為鎮壓公民積極性和社會批評的一種形式，因為這種批評對於任何社會的健全來說都是必要的……我們呼籲你們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全部權力，使法院和檢察機關嚴格遵守蘇聯的法律。

西尼亞夫斯基曾經回憶說^㉓：

俄國知識份子這種典型的內疚感使他們意識到自己的責任，使他們有了說

真話和獨立思考的勇氣。他們拒絕在國家面前認罪，所以不再是忠實的臣民，而只成了一個人，一個獨立的人……在蘇聯所有的重大政治審判中，被告都認罪，已成了一種慣例，被告稱自己為「人民的敵人」。持不同政見者打破了這種壞傳統，證明人就是人，而不能抽象地被分為「人民的朋友」和「人民的敵人」。

而克格勃卻千方百計迫使他們承認自己有罪。

1973年夏天，在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承認自己有罪，而且出賣了近六十名持不同政見者的克拉辛（В. Красин）在其自白書《法庭》中記述了安德羅波夫如何威脅利誘他和雅基爾（П. Якира）的情況：「你同雅基爾立了不少功勞……你們是否考慮一下在記者招待會上在外國記者面前講講話？他們寫了多少關於你們案件的謊言。應該洗一洗他們的腦子。要讓西方知道，你們在法庭上講的話不是被迫的，而是自願的。」^③

最後克格勃的目的達到了，蘇聯的報刊雜誌也進行了大量的宣傳和報導，但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很少有人相信雅基爾和克拉辛的悔過是真誠的，大家都看到了他們二人和政府在道德與政治上的骯髒性，甚至有人懷疑他們二人本來就是克格勃的間諜。

一個在勞改營度過十年的持不同政見者通過觀察，得出一個有趣的發現^④：

近年來大多數被送到勞動營的都是個性比較脆弱的人，當局希望他們屈膝投降，幡然悔悟。而實際上，當局往住也能如願以償，他們沒有把那些被

認為是「死不悔改」的人抓進勞動營，而是採用其他的鎮壓手段，近幾年來主要是強迫這些人移居海外。

也就是說，克格勃在鎮壓持不同政見者的措施上也總結了經驗，吸取了以前的教訓，更多地在於防範或者採取一些社會影響較小的懲罰方法。

四 精神病院和驅逐出境

為了避免公開審判所帶來的不利局面，克格勃經常利用精神病療法迫害持不同政見者，其做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把一些對政府不滿或者是一些對社會沒有危害但是想法不切合實際的人，直接宣布為精神病患者，不顧本人和家屬的反對，強行關入精神病醫院接受治療，從而迫使受害者放棄自己的想法，不去進行所謂的反社會活動。

第二，先把某些要迫害的人逮捕，宣布他們違反了《俄羅斯聯邦刑法》第70條或第190條的規定，然後由法院起訴並立即進行精神病學鑑定。通過精神病鑑定宣布該人為無責任能力的人，這樣法庭就可以在被告人缺席的情況下進行不公開審理，判決將其送入精神病醫院強行治療。

許多這類案件的精神鑑定都是在克格勃直接操縱下進行的，鑑定結果完全取決於法院的需要。有時這類鑑定甚至荒唐到法庭都不能認可的地步。例如對拉托維亞集體農莊主席伊·雅希莫維奇（И. Яхимович）的鑑定書竟然出現這樣的字句：患者「『把公共的事情看得高於個人的事情』、『認

克格勃經常利用精神病療法迫害持不同政見者，主要做法有以下幾種：第一，把一些對政府不滿的人宣布為精神病患者，強行關入精神病醫院。第二，先逮捕某些要迫害的人，然後宣布他們違反了刑法，再由法院起訴並立即進行精神病學鑑定，宣布該人為無責任能力的人。這樣法庭就可以在被告人缺席的情況下進行不公開審理，判決將其送入精神病醫院治療。

驅逐出境乃是制裁持不同政見者的另一措施。70年代中期，尤其是在「歐洲安全和合作會議」談判期間，蘇聯開始迫使大量持不同政見者伴隨着猶太人移民潮流亡西方，以至於在西方的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遠遠多於蘇聯國內。對於一些不願離開祖國的著名持不同政見者，政府甚至不惜採取強行驅逐出境的辦法，索爾仁尼琴就是這樣被趕出蘇聯的。

為自己應該把生命獻給共產主義的理想』、『留大鬍子』、『認為盟國軍隊進入捷克斯洛伐克是侵略』等等」^⑤。

蘇軍退役少將格里戈連科(П. Григоренко)案件是第二種鎮壓方式的一個典型事例。1964年格里戈連科因為組織「為恢復列寧主義而鬥爭聯盟」而被關入精神病醫院。1965年出院後，他不僅積極支持克里米亞韃靼人返回家園的鬥爭，而且，還籌劃成立人權組織。1969年5月7日他為此被捕，法醫鑑定其為精神錯亂症，送往神經病醫院接受「治療」。格里戈連科對鑑定的公正性提出這樣的疑問：「我相信，克格勃的影響遍及整個謝爾比茨基法醫研究所的任何活動……這就產生了這樣的問題：如果檢察官和鑑定人都在一個人的領導下，而且他們彼此又受軍紀的約束，一封精神病鑑定書能夠客觀嗎？」^⑥

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安德羅波夫完全了解格里戈連科的真實情況，但公開審判他必然會激起國內外強烈的反響，因此只好利用精神病藉口把他關起來，進而勸其出國。正是出於如此考慮，克格勃才不惜通過中間人勸說不願出國的格里戈連科到美國其兒子那裏治病，1977年11月24日安德羅波夫為此還專門給蘇共中央寫了一個報告。

克格勃對若列斯·麥德維傑夫(Ж. А. Медведев)的迫害是按第一種鎮壓方式進行的。若列斯·麥德維傑夫在國外出版了幾本有關批判李森科(Трофим Денисович Лысенко)的書，並對蘇聯生物學發展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60年代後期，他的兩本政論性著作《科學家之間的國際合作與國界》和《法律保護秘密通信》在私下出版物上廣泛傳播，引起克格勃的注意。

1970年5月29日若列斯·麥德維傑夫被從家裏強行抓到卡盧加精神病院，主治醫師利甫希茨(Лифушидс)認為他有二重人格現象，「他是個生物學家，可同時他又總是做許多和他的直接責任完全無關的事情。再說，他總是對某些事情感到不滿，總想對某些事情進行鬥爭。」^⑦但由於國內外著名科學家和文化界人士的強烈抗議，尤其是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的抗議信引起國內外一時的轟動，二十天後若列斯·麥德維傑夫被釋放。

驅逐出境乃是制裁持不同政見者的另一措施。70年代中期，尤其是在「歐洲安全和合作會議」談判期間，蘇聯開始迫使大量持不同政見者伴隨着猶太人移民潮流亡西方。馬克西莫夫(В. Максимов)、涅克拉索夫(В. Некрасов)、戈爾巴涅夫斯卡婭(Н. Е. Горбаневская)、阿馬利里克、金茲伯格、西尼亞夫斯基、圖爾欽(В. Турчина)、布科夫斯基、格里戈連科、若列斯·麥德維傑夫等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紛紛移居西方，以至於在西方的蘇聯持不同政見者數目遠遠多於蘇聯國內。阿爾巴托夫認為：「當局這一手十分有效，因為流亡國外的人實際上好像成為叛徒，不僅他本人的名聲敗壞了，而且，他們的立場、他們的著作、甚至支持他們的人的名聲也都敗壞了。」^⑧對於一些不願離開祖國的著名持不同政見者，政府甚至不惜採取強行驅逐出境的辦法，索爾仁尼琴就是這樣被趕出蘇聯的。

勃列日涅夫執政後不久，就開始了對索爾仁尼琴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的批評。索爾仁尼琴的長篇小說《癌病房》(*Cancer Ward*)和

《第一圈》(The First Circle) 在國外出版後，政府開始加大對他的壓力。1969年俄羅斯聯邦作家協會開除了索爾仁尼琴的會員資格。1970年10月8日，當索爾仁尼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公布後，蘇共中央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就開始討論如何處理索爾仁尼琴的問題。

1973年秋天，克格勃在列寧格勒搜查到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 1918-1956) 一書的大批手稿，當時國外報紙也在不斷報導有關《古拉格群島》一書將要在國外出版的情況。1974年1月7日蘇共中央再一次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關於制止索爾仁尼琴反蘇活動的措施」的決議^⑨：

鑑於索爾仁尼琴進行惡毒的反蘇活動，包括誹謗蘇維埃制度、蘇聯和蘇聯共產黨內外政策……並且把為國內外反革命份子和敵視蘇維埃的勢力和集團進行辯護的各種書稿、信件、訪談錄交給外國出版社和新聞社的行為，以及他粗暴地破壞日內瓦國際著作權公約關於在國外出版社出版自己文學作品的規定，追究他的法律責任。

政治局會議之後，國家安全委員會一方面加緊開展批判索爾仁尼琴的運動，另一方面積極活動，為驅逐索爾仁尼琴聯繫接收地點。1974年2月14日《真理報》和《消息報》同時刊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決定^⑩：

由於索爾仁尼琴系統地從事與蘇聯公民身份不相符合的行為，而這些行為已經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造成危害，根據1938年8月19日通過的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國籍法》第七條規定，茲決定剝奪索爾仁尼琴蘇聯國籍並將其驅逐出境。

隨後，索爾仁尼琴被押解登上前往法蘭克福的航班，開始了自己的流亡生活。

總的來說，蘇聯政府對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政策和措施是一貫的，那就是一方面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強化意識形態控制，千方百計削弱持不同政見者產生的社會基礎。然而，墨守成規、不思進取和嚴重脫離實際的政治思想工作內容，限制和壓制任何不同於官方意識形態的做法，以及僵化教條的工作作風導致政治思想工作收效甚微。另一方面就是進行思想鬥爭，即採取政治上施加各種壓力、監督勞動、逮捕審判、關押判刑，甚至不惜採取精神病療法和驅逐出境的方法來鎮壓這些給社會主義制度抹黑的人。在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前期，政府更傾向於公開鎮壓，從1956-1980年因為從事反蘇宣傳與散布「攻擊蘇聯國家與社會制度的故意造謠誹謗」而被判刑的人數統計，可以看出這一趨勢：「1956-1960年因政治原因而被判罪的蘇聯公民共有4,676人。1961-1965年被判罪的為1,072人，其中1965年被判罪的總共是20人。1966年為48人，1967年為103人，1968年為129人，1969年為195人，1970年為204人。1976-1980年總共為347人。」^⑪當然，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材料所公布的數字同持不同政見者的實際人數可能有很大出入，因為許多持不同政見者是按刑法一般條款審判的，而且，被判處送精神病院或驅逐出國的持不同政見者都不經法律手續。另外，許多持不同政見者是通過行政、黨或

1956-80年因為從事反蘇宣傳與散布「攻擊蘇聯國家與社會制度的故意造謠誹謗」而被判刑的人數統計：1956-60年因政治原因而被判罪的蘇聯公民共有4,676人。1961-65年減至1,072人，1976-80年總共為347人。從數字可以看出，蘇聯政府從早期的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公開鎮壓，轉變為採用更加多樣化的方法。

別的渠道施加壓制的形式處理的。但是，通過這一材料最起碼能夠說明70年代以來，蘇聯政府盡量減少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公開審判，方法更加多樣化了。

註釋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三十一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115；132；149；196；504；502。

⑨⑩⑪ 阿爾巴托夫（А. Арбатов）著，徐葵等譯：《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頁191-92；317；200。

⑫ РГ А Н И（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ф. 5, оп. 30, д. 462, л. 231。

⑬ 藍英年：《利季婭被開除出作協》（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頁24-25。

⑭⑮⑯ А. В. Коротков, *Кремлевский самосуд: секрет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Политбюро о писателе А. Солженицыне*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осква, 1994), 46; 362-63; 447。

⑰ 布爾拉茨基（Fedor M. Burlatskii）著，易崇譯：〈勃列日涅夫與解凍的破滅〉，《蘇聯問題譯叢》，第四期（北京：三聯書店，1989），頁26。

⑱⑲⑳ 羅伊·麥德維傑夫（Рой. Медведев）著，劉明譯：《論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北京：群眾出版社，1984），頁43；26；25。

㉑㉒ ЦХСД（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ф. 3, оп. 80, д. 433, лл. 75-77；ф. 4, оп. 20, д. 82, л. 50。

㉓㉔㉕ В. А. Козлов, “Крамолла: инакомыслие в СССР во времена Н. Хрущева и Л.Брежнева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Верховного суда и Прокуратуры СССР)”, *Статья 2,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02, 4), 71; 71-72; 72。

㉖ М. П. Михайлов, В. В. Назаров,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диверсия — оружие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Москва, 1969), 16。

㉗ А. Кокурин, Н. Петров, “КГБ: структура, функции, кадры”,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1998, 2), 123。

㉘ РГ А Н И, ф. 89, печенень 51, док. 3, л. 7。

㉙㉚ А. Амальрик, *Просуществовали ли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до 1984 года?* (Амстердам, 1970), 29; 23。

㉛ 阿馬利里克（А. Амальрик）著，萬成才譯：《被迫的西伯利亞之行》（北京：新華出版社，1981），頁15。

㉜ *Московская правда*, 29 июля 1992。

㉝ *Правда*, 29 августа 1993。

㉞ Андрей Сахаро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осква, 1996), 498。

㉟ Рой. Медведев, *Неизвестный Андропов* (Москва, 1999), 161。

㊱㊲ Рой. Медведев, *Книга 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Амстердам/Париж, 1972), 181-82; 185。

㊳ 西尼亞夫斯基（А. Синявский）著，薛君智主譯：《笑話裏的笑話》（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頁386。

㊴ В. Красин, *Суд* (Нью-Йорк, 1983), 73-74。

㊵㊶ 若列斯·麥德維傑夫、羅伊·麥德維傑夫著，錢誠譯：《誰是瘋子？》（北京：群眾出版社，1979），頁176；33。

㊷ Григоренкр, “О специальных психиатрических больницах”, *Хроника текущих событий* (《時事紀事》私下出版物11期). 31 декабря 1969 г. www.memo.ru/history/index.htm。

㊸ “Вестник Архив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Источник* (1995, 6), 153。

郭永勝 1959年生，男，博士，內蒙古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從事蘇聯歷史和伊斯蘭教問題研究，先後發表論文二十多篇。